



# 失业的悲剧

麦智道、普拉卡什·洛嘉尼

各国政府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降低失业率及人力成本

当前，世界正面临失业危机。估计目前全球失业人口达到 2.1 亿，自 2007 年以来增加了 3000 多万人。在所增加的失业人口中，有 3/4 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在“大衰退”的风暴中心——美国，失业问题尤为严重，其失业人数增幅最大。与 2007 年相比，美国的失业人数增加了 750 万人。尽管据称美国经济衰退的状况已在 2009 年 6 月结束，但以往几次的经济复苏状况表明，就业状况得到恢复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收入得到恢复的时间（见图 1）。

由通胀率和失业率之和构成的痛苦指数，现在已几乎全部由失业率所包揽（见专栏）。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就业状况的缓慢复苏可能对失业人口带来极大的危害。研究表明，失业对失业人口所造成的代价包括：由于职位下降导致收入的持续下降、预期寿命缩短、其子女学业成绩和收入的下降等。对于那些长期失业者，上述代价更为严重。

失业问题涉及众多方面。本文将分析以下方面的问题：

- “大衰退”期间失业所造成的人力成本，以及政府为避免失业问题扩大化所采取的对策；

- 政府近期为促进劳动力市场复苏而采取的政策；

- 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所构成的挑战。

## 失业所带来的人力成本

有关过去几次经济衰退影响的研究为我们很好地揭示了失业对个人及其家庭所带来的长期高昂的代价（有关调查请见麦智道和洛嘉尼，2010年）。

裁员所带来的收入损失不仅出现在失业期间，而且还持续至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见沙利文和冯·沃奇特，2009年）。如果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这种损失会更大。根据对美国 and 欧洲的研究显示，在经济衰退期间一度失业的工作者在长达 15—20 年之后，其收入比未失业工作者的收入要低 20%。失业对长期收入的负面影响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而言，表现最为明显。在经济衰退期间，年轻人往往只能选择比经济繁荣时期更差的工作。随着他们家庭生活和职业的稳定，将更难以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其他国家(如德国)也存在这种失业所带

### 量化痛苦

痛苦指数是通胀率和失业率之和。在 198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该指数作为衡量经济不景气状况的一项指标得到普及。自此以后，该指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持续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胀率得到了抑制（见图 2）。然而，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在“大衰退”期间，失业率对痛苦指数的贡献急剧上升。

来的收入长期大幅降低的状况。如同德国的情况所示，甚至在那些社会福利制度好于美国和收入差距小于美国的国家中，工作者们也无法避免裁员导致其终生收入降低的局面。

失业所带来的人力成本不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据最新的研究显示，裁员还可能伤害健康状况，甚至导致死亡。为了排除一些错误的关联因素（如认为身体不好的人可能生产效率更低，也因此更可能失业）以及其他易于产生混淆的因素，这些研究项目采用的数据集都对相关人员之前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情况、家庭和其他背景特征进行了控制，并保证其健康状况和对工作的影响在考察时间上的一致性。即便在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在短期内，裁员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由心脏病和其他由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风险。从长期来看，被裁人员的死亡率往往高于未失业工作者的死亡率。比如在美国，由于失业导致的死亡率增加的状况估计将最高持续至失业后20年，导致平均寿命降低1—1.5年。

失业还可能导致失业家庭子女的学习成绩下降：一项研究发现，那些父母失业的孩子留级的可能性较其他孩子高15%。从长期来看，父亲因失业导致的收入损失还将降低其子女未来的预期收入。例如在加拿大，父亲失业的子女其年收入估计比那些父亲有工作的子女年收入少10%左右。在考虑其他可能影响收入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后，上述关系同样成立。在瑞典，父母收入较低与子女今后的死亡率显著上升呈正相关关系，即便考虑子女自身的收入和教育因素也是如此。

工作者失业的时间越长，这种代价就可能更大。失业不仅会导致收入上更大的损失，同时长期失业的人口也会丧失自信心和技能，并脱离于整个劳动力大军之外。这将进而影响潜在雇主对这些失业人口的看法，并减少他们再次就业的机会。根据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失业时间超过六个月的人在此后的30日内再次找到工作的几率仅为1/10。相比之下，失业时间不足一个月的人在随后的30日内再次找到工作的几率为1/3。因此，长期失业意味着周期性的失业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 政府施以援手

针对这种状况，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对策。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失业状况以及相应的人力成本将会更为严重。总体而言，这些对策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 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
- 开展短时工作计划及失业保险福利，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 提供雇佣补贴，以减少裁员并加快就业复苏。

各国央行也迅速采取措施，通过降低政策利率刺激总需求。在银行利率降至接近零点的水平并无法进一步降低的情况下，则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直接购买政府长期资产）以及其他干预措施来刺激总需求。

各国的财政政策转换为宽松财政政策，同时，各国政府将财政赤字周期性加大归咎于经济衰退导致的税收降低，而不是尽力通过削减财政支出来降低财政赤字。此外，很多国家的政府向其金融业提供直接支持，即金融刺激计划和所谓的“银行救助”计划（参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刺激政策见效了”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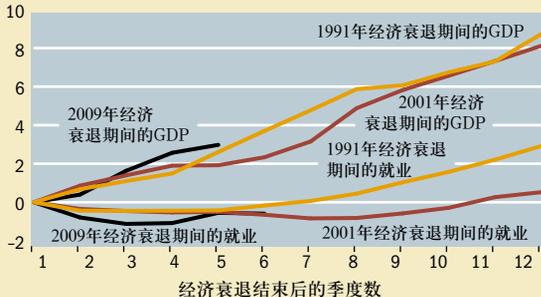
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各国政府在推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同时，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其中一项重大政策是为企业提供政府财政资助，以鼓励企业实施保留员工但减少其工作小时和工资的计划。此类短时工作计划可以将经济衰退带来的

图1

### 经济复苏期间，就业复苏的速度相对滞后

美国1991年、2001年和2009年开始的经济复苏状况表明，就业复苏所需要的时间大大超过GDP复苏所需要的时间。

（经济衰退结束后的变动状况，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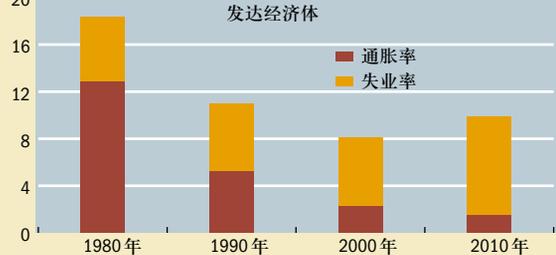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

图2

### 衡量经济不景气

痛苦指数是通胀率和失业率之和，现在随着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率得到抑制，该指数已几乎全部由失业率所包揽。

（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压力在员工和雇主之间进行更加公平的分担，降低未来的雇佣成本，并保护员工这种人力资本直至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在“大衰退”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广泛应用了此类计划。尽管现在对此进行全面评估仍为时尚早，但人们认为这些计划在抑制众多国家的失业状况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各国政府通过提供失业保险金缓解了失业压力。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延长了领取这些保险金的持续时间；其他一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持续期间继续延长领取这些保险金的持续时间。比如，美国将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时间从26周延长至99周。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保险金对找工作的潜在负面影响估计微乎其微（见麦智道和洛嘉尼，2010年）。

该项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财政补贴来直接加快就业状况的复苏。通常，很难设计出有效的雇佣补贴政策：此类政策可能带来的情形是，企业将这些补贴用于设置他们本来就必须设置的工作岗位，或者设置那些根本没有必要且将来也无需保留的岗位。不过，在经济严重衰退的过程中，这种无效举措的成本要低于高失业率所带来的成本。各国针对那些所受影响最为严重的领域提供补贴的措施可能有助于降低这种无效成本。这些补贴政策分别针对长期失业人口和年轻人等弱势群体（如在奥地利、芬兰、葡萄牙、瑞典和瑞士）、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如韩国和墨西哥），或者特殊行业（如日本的服务业等）。

### 下一步将采取何种措施？

在未来一年内，上述在经济危机期间采取的三步战略仍需继续得到实施。不过，随着经济的稳步复苏，上述各个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将会发生转变，同时各个国家根据其具体情况也应有所不同。

总需求的复苏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佳办法，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在尽可能的程度上继续为总需求的复苏提供支撑。发达经济体2011年的削减赤字计划意味着这些经济体的结构性盈余将平均降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5个百分点。经济发生更为重大的调整可能抑制本已疲软的国内需求。

不过，各国之间的财政状况显然各不相同。各国现有的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差异很大（见图3）。各国的财政赤字，即进一步增加债务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大？为了回答该问题，奥斯特里等人（2010年）确定了一项“债务限额”指标，即一旦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该限额比，一国针对不断增加的债务所采取的常规财政应对措施将不足以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常规对策通常基于一国以往的税收和支出记录。

根据债务限额比和预计2015年债务对GDP比值之间的差额，可以估算出一国的财政赤字增长空

间。由于常规财政对策的估计存在不确定性，对财政赤字增长空间的估算也存在不确定性。在图3中，红色显示的是那些财政赤字增长空间达到GDP百分比50%及以上的可能性极低的国家，包括希腊、冰岛、意大利和日本。黑色显示的是那些财政赤字增长空间较有可能达到GDP百分比50%及以上的国家，包括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这些估算数据表明，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从中期来看必须采取可靠的紧缩财政政策，而不是现在的宽松财政政策。

目前，货币政策仍是带动社会总需求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通胀压力已经得到抑制，预计2011年各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仍将保持在1.5%左右。因此，众多发达经济体仍可以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此外，如果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货币政策将成为众多发达经济体首先采纳的应对工具。鉴于很多经济体的政策性银行利率已接近零点水平，各国央行可能被迫再次更加依赖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尽管这些刺激需求的措施对确保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似乎必不可少，但也必须同时考虑这些措施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和外部平衡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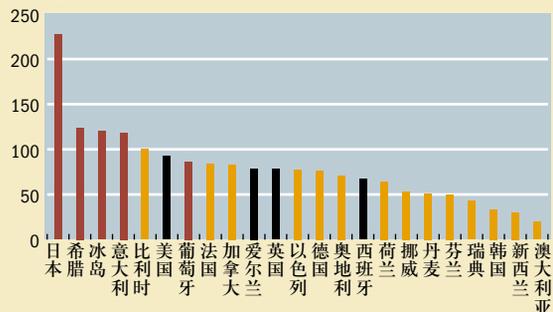
如果各国经济稳步复苏，在经济危机期间引入的为短时工作提供的补贴和各种雇佣补贴可以开始逐步取消。此类补贴会对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并且让企业在即便市场状况得到改善后也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思想。如果某些企业和行业的收入持久地受到影响，

图3

#### 作出响应的能力

一国债务增加的能力，即财政赤字增长空间，不仅取决于本国的债务对GDP比率，同时也取决于其以往的财政支出和税收状况。图中显示为红色的国家，其债务增加能力将受到抑制，显示为黑色的国家则相对较好。

（公共债务占GDP的百分比，2010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估算；奥斯特里等（2010年）。

注：红色柱体表明一国的财政赤字增长空间很可能不能达到其GDP的50%；黑色柱体表明一国财政赤字增长空间超过GDP的50%的概率适中。

提供上述补贴也可能阻碍资源再分配至其他行业。此外，失业保险金的提供应与强制性就业培训和社区服务紧密联系，以使那些失业人口能够与劳动力市场保持联系。

## 长期失业带来的挑战

自从“大衰退”发生以来，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长期失业人口（失业时间达到27周及以上）的比例均出现了增长。在这一比例未出现增长的部分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危机出现之前其长期失业率就已长期居高不下。在美国，自1980年以来的每次经济衰退期间，失业时间达到27周及以上的失业人数占失业总人数的比重都会有所增长，但此次“大衰退”期间这一比重的增长幅度尤其惊人：在所有的失业人口中，接近一半的失业者失业时间达到27周及以上。

图4

### 财富的缩水

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很多是由于部分行业长期衰退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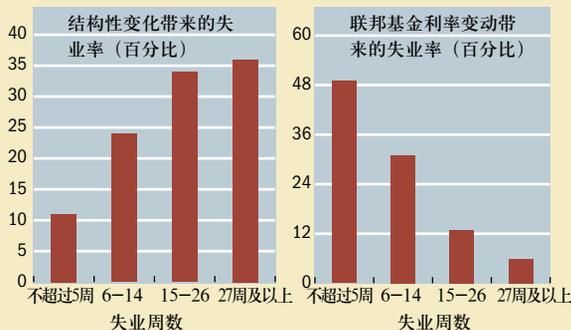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Data Stream。

注：长期失业，即失业时间达到27周及以上的失业。结构性变化指数采用的是不同行业的股票收益率。股票收益在各个行业中的分散程度体现的是各个行业相对财富的预计差异程度，该比例越大，则结构性变化指数值越高（0-1之间）。

图5

### 失业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

美联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状况对短期失业率的影响超过对长期失业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作者的计算。

“大衰退”期间长期失业率的增长，绝大部分是由于结构性原因。这是因为经济衰退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可能大相径庭。部分行业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后随着整体经济的回升而复苏。其他部分行业，如医疗卫生等部分服务行业，则很容易摆脱经济衰退的影响。而另外部分行业则会处于长期衰退之中。从事后来看，这些行业多数情况下是在经济衰退前扩张过快的行业，比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高科技行业，以及“大衰退”之前的建筑行业。

图4采用美国不同行业的股票收益率数据，描绘了反映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数变动状况。股票收益在各个行业中的分散程度体现的是各个行业财富的预计差异程度，该比例越大，则结构性变化指数值越高。从以往来看，经济衰退之前或经济衰退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化越大，则长期失业发生率越高。在“大衰退”期间，该指数大幅增长，同时长期失业率也急剧走高。在很多其他发达经济体中，结构性变化的强度和长期失业发生率也存在类似的增长状况（见陈等，即将出版）。

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带动社会总需求的复苏将促进长期失业率的降低。不过，有证据显示，社会总需求的复苏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带动长期失业率的走低，同时，即便如此，其影响幅度也很有限。例如在美国，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对短期失业率的影响超过其对长期失业率的影响（见图5，右栏）。相比之下，结构性变化指数与长期失业率的联系要大于短期失业率（见图5，左栏）。

这表明，应对长期失业问题需要在采取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的同时，辅以更针对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再培训计划），使长期失业人口重新就业。■

麦智道（Mai Chi Dao）是IMF研究部经济学家，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该部顾问。

#### 参考文献：

- Chen, J., P. Kannan, P. Loungani, and B. Trehan, forthcoming, "Stock Market Dispersion and U.S. Long-Term Unemployment,"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Dao, Mai Chi,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0, "The Human Cost of Recessions: Assessing It and Reducing It," background discussion paper for the Joint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MF conference on the Challenges of Growth, Employment, and Social Cohesion, September (Oslo).
- Ostry, Jonathan D., Atish R. Ghosh, Jun I. Kim, and Mahvash S. Qureshi, 2010, "Fiscal Space,"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10/11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Sullivan, Daniel, and Till von Wachter, 2009, "Job Displacement and Mortality: An Analysi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4, No. 3, pp. 1265-1306.